

维护共享单车停放秩序的“城市猎人”

■周一有约

王晓洁 陈 旭

“拿出手机就骑车”，让城市生活变得更加方便。根据共享单车平台之一“摩拜单车”提供的数据，2017年春节期間，14个摩拜运营城市中，骑行距离最远的一单达到30公里，各城市使用的峰值大多集中在下午或者傍晚。在广州，得益于温暖的天气和新春赏花习俗，即使在除夕凌晨时分，仍有超过万人骑共享单车出行。

然而，在使用共享单车的人群中，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特殊群体——“猎人”，他们“潜伏”在城市各个角落，寻找违规停放的共享单车，维护共享单车的秩序。

27岁的高小超就是其中的一员，在业余时间喜欢在街头巷尾“打猎”。大年初七，他便当起了“猎人”。

在北京市鼓楼大街附近，高小超打开手机，用摩拜单车APP锁定了“猎物”位置。在导航指引下，小高进入一个建于上世纪80年代的小区，不过10分钟，他就找到了“猎物”——一辆违规停放的共享单车，然后把车子停放到小区外面的公共区域。

高小超来自河北石家庄，玩过乐队、喜欢摄影，是一名网页设计师。2016年，共享单车出现在北京，这让高小超欣喜不已。

“之前从家到地铁口要走10分钟左右，从公司到地铁口差不多也要走10多分钟。有了共享单车，每天能节省不少时间。”高小超说。

高小超成为共享单车不折不扣的粉丝。不过，在使用过程中，他发现了不少问题。有人乱停乱放单车，也有人给车上私锁，甚至有人把车停在自家小区楼内或干脆搬到家里。于是，高小超加入“猎人”队伍，纠正这些不良行为。

“打猎”是摩拜单车粉丝们的自发行为。粉丝们觉得，维护共享单车秩序是举手之劳的“正能量”。去年底，一个摩拜粉丝在北京后海发现一辆落水的共享单车，拍摄图片后发到群里，又有人把情况反映到单车运营商，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最终打捞起了这辆落水的单车。

“这些不当使用共享单车的人，有刻意的，也有无意的。可以通过扣除使用者信用积分的方式，提醒他们规范用车。”高小超说。

摩拜单车的工作人员李婷告诉记者，“打猎”

是用户们的自发行为，公司不支出任何费用。如今，摩拜单车的北京粉丝群里，不少人都当过“猎人”。他们和高小超一样，在城市的角落里寻找失落的单车，默默纠正大城市里存在的“小问题”。

一开始，高小超的家人并不支持他当“猎人”。但当家人也开始使用共享单车时，体验到了高小超工作的价值。现在，高小超的父母还会向街坊普及规范使用单车的经验。

共享单车在使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也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在今年的北京市两会期间，北京市政协特别邀请人士曹长胜呼吁，市民应该主动维护共享单车，规范停放。北京市政协委员王静提出，目前北京市自行车专用道设置比例少，未来政府应积极改善骑行环境。

(据新华社)

蒋兴良：让电网与冰雪“绝缘”

■寻找最美科技人员

本报记者 刘 垠

从重庆大学驱车700多公里后，不顾疲累的车子一头扎进浓雾，循着悬崖边的土路缓缓上山。终于，车里的寂静被司机拉上手闸的声音划破，人们长长出了口气。

这里是地处湘西、云雾深处的雪峰山试验基地。化不开的浓雾中，前面的人变的影影绰绰。“这不算啥子，雾大时面对面的人都看不清咯。”身着老旧的灰工作服，手捂一只仅露半张脸的“雷锋

帽”，55岁的蒋兴良一瘸一拐爬上电气特高压试验塔，转头不忘叮嘱：“雾大湿滑，你们小心脚下”。

就在刚刚过去的春节，为腰疼所困的蒋兴良在雪峰山基地收获覆冰除冰研究新进展，不仅首次在自然环境试验特高压直流绝缘子串覆冰及放电规律，而且研究并提出风机叶片电热除冰方法，实现了导线的电脉冲除冰。

野外坚守30年，重庆大学电气工程学院教授蒋兴良的工作是让高压线与冰雪“绝缘”，先后奔赴高海拔、高山冰雪等生命禁区做试验，建立世界首个野外自然覆冰试验基地，成功破解西电东送、三峡工程、青藏铁路等输电难题……

费用且难估算。几位参与试验的老师，最终同意了蒋兴良的大胆决定：现场拆卸变压器，自己修理。

修复过程远比想象的艰险。在吊装变压器铁芯过程中，学生冉启鹏伸着脑袋进去查看时，吊装滑轮突然松动，2吨多重的铁芯下坠。一片惊叫声中，滑轮滑了几米后嘎然而止，而铁芯距离学生的脑袋仅有10公分。

说到惊心动魄处，蒋兴良语速加快、声音变大，“这件事给我后来所有的现场试验一个极大教训，无论多么困难，首要的是师生和工人的安全。”接下来的高原试验中，蒋兴良为师生们购买了120万元的工作保险。

2005年9月，蒋兴良从青藏高原试验返回重庆，同事开玩笑说他就像一条被柴火烘干的黑腊肉。就是这股迎难而上、不言放弃的犟劲儿，他一举攻克青藏铁路供电工程外绝缘和隧道电气间隙设计的难题，海拔5000米获得的研究成果至今令人超越，负责完成的研究成果“恶劣环境中空气外绝缘放电特性及其在电网中的工程应用”获得2009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融冰除冰时间，能给国家省下多少电。”蒋兴良说，在对全国覆冰广泛调查后发现，湖南雪峰山历来覆冰重频率率高，覆冰类型多样，程度严重，是研究电网覆冰的理想场所。

没有专用经费，蒋兴良积极寻求地方政府、企业支持，广泛发动青年教师和研究生投身基地建设。蒋兴良和团队自行设计、请民工施工，自己开挖土石，平整试验场地，搭建活动板房。5个月



蒋兴良在检查试验塔上的设备

后，世界首个自然(覆冰)试验基地的基本试验构架建设完成。

在2008年11月—2009年2月第一个覆冰季节，试验基地还只有简易的试验构架和试验线段，活动板房内温度几乎和外面一样。蒋兴良依然记得那种刺入骨头的冷冽，狂风吹得板房吱吱欲裂，板房屋顶凝结的水滴像小雨一样滴入被子与口鼻，晚上无法入睡。覆冰太严重，断电一个星期，大雪封山车辆上不了山，后勤供给无法送达。老师和同学们只好拿雪擦手洗脸，啃干方便面，一个星期都没刷牙。

彼时创建基地的艰辛，定格在大伙身着解放鞋劳保服、浑身沾满稀泥的老照片中。蒋兴良属牛，不仅倔强而且不按常理出牌。自2008年以

坚守野外30年 不惧伤痛无悔初心

30年间，蒋兴良潜心研究怎么在各种极端天气下保证供电，这让双腿遭了老罪。2005年夏天，他感觉双腿麻木，左肋骨隐隐作痛，医生要求做全面检查，可蒋兴良一心惦记青藏高原的试验和学生们，认为空闲一点再去吃药或做个理疗就没事了。

直到2015年9月，疼痛难忍的他去重庆第三军医大检查，医生确诊为脊椎管瘤，必须立即手术，否则会造成瘫痪。医生要求手术后至少卧床三个月，但在手术后不到一个月，蒋兴良又跑回雪峰山，亲自督促和实施基地大型试验装备的建设。蒋兴良深知，覆冰防冰是一项极具挑战的世

来，六个春节是在试验基地度过，有五个春节带妻儿上山过年，“我经常哄劝妻儿，雪峰山试验基地空气好、水好，蔬菜都是自己种的，健康卫生，比重庆好多了。”

如今的雪峰山试验基地，从简易平板房变为“独具特色、不可替代”的自然覆冰试验基地，持续攻关的系列科研也进入成果收获期：“电网大范围冰冻灾害预防与治理关键技术及成套设备”，荣获2013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在应对电网覆冰灾害防御方面，蒋兴良和团队揭示了超特高压分裂导线覆冰融冰的规律，建立了电流融冰的物理数学模型，理论计算方法指导研制的直流融冰装置在湖南、江西、安徽等地大规模推广，成功实施数百次直流融冰。

界难题。只有坚持不懈地深挖钻，才能揭开覆冰的形成规律和导致灾害的神秘面纱。“我们在恶劣环境下进行试验，最终目的是建立动态的数学模型，通过模型模拟计算野外自然覆冰的各种状况，得出具有指导意义的结论，摆脱人工模拟的艰辛和野外恶劣环境的束缚。这也是我们下一阶段的研究目标。”蒋兴良深信，任何事情，只要坚持总会有收获。

值得一提的是，8年间，蒋兴良每年往返重庆到雪峰山的700公里近二十回，自己购买私家车7年来中，至今行车不过10万公里，其中8万公里用于接送往返基地试验的师生们。

滤纸电泳仪，但单位无力向国外购买，她和同事们一起分析研究，决定自己动手做一台。

于是，仅用一台报废汽车的电瓶和发报机用直流电源，她最终做出了电泳仪。没花一分钱，也没聘请任何专家，这项简易而好用的“创新”成果在日后的科研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丝毫不比国外的先进仪器差。张树政的第一篇论文《霉菌淀粉酶的纸上电泳分离和鉴定》，就是在这个“汽车电瓶电泳仪”分析的基础上撰写出来的。这篇篇幅不长，在当时颇具创新性的论文，是我国最先公开发表的有关由霉产生的淀粉酶种类的研究报告。

化学教育家方秉教授曾是张树政的导师方心芳先生的老师，听说张树政做出了电泳仪，很是兴奋，专门派人从西北大学来北京学习制作电泳仪的技术，于是当时就传出一句佳话——“老师的老师请教学生的学生”。

后来，张树政研究组在实验需要一台等电点聚焦仪，他们采用了同样的方法，自主攻关，自力更生，协调各方力量，做出了具有同等功效的设备。由此，她带领学生们在国内首先建立了等电聚焦和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等新技术，应用于红曲糖化酶的研究，并在世界上首次得到了这种酶的结晶。

张树政晚年曾对记者说，为了科研事业和自己的理想，她放弃了很多女性应该享有的幸福，对亲人，她也有着许多追不回的遗憾，但她是为了做自己喜欢做和应该做的事，甘愿付出这么多，她觉得值得。

■人物点击

朱赢椿：让虫子“写”书



朱赢椿

中国设计师朱赢椿作品——一本纯然由昆虫爬行痕迹自然形成的“无字天书”，近日在德国莱比锡被评选为2017“世界最美的书”银奖作品。

“世界最美的书”是全球最具影响力的书籍装帧艺术评比。今年“世界最美的书”组委会共收到来自全球32个国家和地区的参评作品近600件，最终推选出14本2017“世界最美的书”，分别来自世界7个国家和地区。

虫子们怎么创作？朱赢椿在个人工作室“随园书坊”外开了一个菜园，虫子啃噬菜叶留下的痕迹，被他当作“生命的偈语”采集留存。此外，他还让虫子身体沾上墨汁，在白纸上爬行，留下虫子的“墨宝”。《虫子书》里满满都是字，但这些虫子写的字无异于“天书”，读者看不懂，书店里翻的人多，买的人少。

朱赢椿倒是不急，因为早有思想准备，初做样书时有很多朋友提醒他这一步迈得太大，他的回答却很任性：“我不管，我就要一步步迈这么远。”

朱赢椿种菜五年，收集到的虫子相关素材十分丰富，加之专业做书二十多年，熟知各种打造畅销书的诀窍，完全可以找出一种读者喜闻乐见的方式。并且此前出版的《虫子旁》，暖调加美文，温情脉脉地呈现观虫日记，已算一个成功案例。

而这次的《虫子书》，他偏要走极端，用一本读不懂的“天书”，将读者隔绝在外。朱赢椿说：“我想冒一个险，做到极致，让它达到一个高度，然后我们可以再落下来。”

这是一条孤傲的路。朱赢椿也的确有傲气，听听他用作自我介绍的冷笑话：“我的家乡在淮阴，据我所知，淮阴出过两个人，第一个是韩信，第二个是朱赢椿。”

傲慢——除了“傲”之外，朱赢椿还有一大特点就是“慢”。从《虫子书》的创作过程就可看出他的生活态度：“开半亩田，种五年菜，邀百种虫，集千形文，成一本书。”在工作室外的菜园子里，他煞有介事地放了一个“慢”的交通标志，一来提醒客户不要火急火燎地催他交稿子；二来提醒客人缓步慢行，注意脚下，不要踩到他的虫子邻居。

(据新华社、腾讯文化综合报道)

■第二看台

大漠“追星”记

刘 海

和很多“90后”一样，23岁的王岩喜欢“追星”。然而，他的偶像是一位在大漠深处奉献多年的时任宁夏灵武市白芨滩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王有德。

这位与风沙对着干了一辈子的汉子，30多年如一日，带领白芨滩干部职工以每年治沙造林3万亩的速度，在毛乌素沙漠西南端筑起一道东西长45公里，南北宽10公里的绿色屏障，守护着黄河以及河岸万顷良田。曾获得感动中国“双百”人物、“全国治沙英雄”“全国劳动模范”等诸多荣誉称号。

虽然已经过去近4年时间，王岩依然清晰地记得人生中第一次“追星”的情形：满怀希望而来，却连“偶像”的面都没有见到，失望而归。

“我们班同学都特别想见他，王劳模，因为他工作繁忙，结果也没有见上。”王岩的话语中满是遗憾。

那时的王岩，是宁夏葡萄酒与防沙治沙职业技术学院的一名学生，那是他和同学们第一次到白芨滩实训。

对王岩来说，把治沙英雄当作偶像和日后选择治沙作为职业都并非心血来潮。

王岩的家乡在灵武市崇兴镇台子村，一个沙漠边缘的小村庄。也许是从小饱受村庄遭受沙漠侵袭之苦，也许是家里好几位亲人都走上了治沙路，王岩从学生时代起就对治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2011年，王岩考入宁夏葡萄酒与防沙治沙职业技术学院，成为防沙治沙工程系的一名新生。这所前身为宁夏林业学校的学院有着30年的办学历史，也是目前国内唯一一所培养防沙治沙人才为己任的职业技术学院。在这里，学生们系统学习防沙治沙专业技术，并在一次次的实践中提升动手能力。

第一次到白芨滩实训，给王岩留下深深的震撼，“把一个寸草不生、寸草不长的沙漠变绿了，我觉得挺伟大的。”2014年，王岩圆满完成学业，如愿加盟白芨滩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成为一名光荣的治沙人。更令他高兴的是，终于见到了心目中的“偶像”，而且有机会一起工作。

“我刚来的时候王有德还没有退休，我亲眼见过他工作，大热天的，50多岁的人还拿着锹在沙地里干活，让我们这些无从下手的年轻人都感觉很羞愧。”王岩说。

劳模精神的感召，加上前所未有的使命感，让王岩像一只铆足了劲儿的陀螺。然而，治沙远比想象中辛苦。

“7月份的时候我到一线沙区去治沙，去的第二天胳膊上一层皮就掉了。到第二年开春的时候，站在远处看那个山绿了，特别有成就感，因为特别不容易。”王岩说。

在白芨滩，像王岩这样的年轻人还有很多，他们大多是追随父辈甚至祖辈脚步走上治沙路的“白芨滩二代、三代”，在日复一日的努力工作中，成就着心中的理想。

在白芨滩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王兴东看来，他们是“有知识的一代”，也是“继承了白芨滩精神的一代”。（据新华社）

(图片来源于网络)

大真大爱，一生情系微生物

——追忆中国科学院院士张树政

■留声机

刘黎琼



1984年，张树政在中国科学院菌保所做实验。

“终生求知好学务真务实心底无私，一生光明磊落对人对事清白无暇。”在学生金城研究员眼里，这幅挽联恰切贴地概括了老师张树政。这位著名生物化学家、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研究员的一生，纯粹而挺拔。

2016年12月10日，她和情系一生的微生物科学，挥手作别。

讲真话做真学问

张树政在微生物生化及酶学研究方面有重要贡献，在白色霉糖代谢、红曲霉糖化酶结构与功能、糖苷酶和耐热酶等的研究中有新的发现，居当时国际先进水平。由她开创并由其学生继续完成的黑曲霉糖化酶的应用取得重大经济效益。

这一切都源于她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生物科学是一门操作性、实践性强的实验科学。对数据弄虚作假、坐办公室不做实验等行为，张树政嗤之以鼻。她力行严格的实验操作，要求所有实验必须亲自主手，实验重复三次，直至实验数据重复规律相符。

“文革”中，张树政只能依附在学生黎高翔的固定化酶组工作，但她没有怨言，接受了学生分配的研究工作。她一如既往地埋头苦干，每天孜孜不倦地做实验，年终提交了完整而详实的实验数据论文，众人敬佩不已。

张树政的治学是出了名的认真。上世纪80年代他曾为一个生物化学名词的汉译查找了两个星期的文献，1990年代又为一个真菌学界争议的名词翻译了上百页的最新版《真菌学词典》，先后修改10稿方才发表。无论是自己做论文，还是修改学生论文，她都是精雕细琢，一个标点符号也不容出错。

而她“务求真和无畏打假的精神”更是给学者朱正美“很大震撼，受到极其深刻的教育，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那是1990年，在国家基金委召开的一次国家级自然科学奖的评审会上，在审查、讨论一项国家一等奖时，张树政以确凿证据，逐一指出申请书上多项内容的真实“出处”，甚至拿出了复印材料作为铁证，提出了反对意见。由于列举的材料翔实，无辩驳的可能，参审者一致通过了她的意见，驳回了这份看起来“很有分量”的申请。

从无到有仿制国外先进仪器

中国科学院菌种保藏委员会成立之时，百废待兴，先进仪器甚少。1955年，张树政在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学习纸色谱及纸电泳技术，见到了